

鲜卑新论

鲜卑新论

张博泉 著

0406

长白丛书研究系列序言

研究以资料为先，理论以实践为源。旨在开发乡邦文献的《长白丛书》整理工程，已出五集近二千万字，为研究东北提供了基础资料，寓于地方文献之中的长白文化重放光华。东北区域文明的研究热潮悄然兴起，推动《长白丛书》向研究系列二期工程挺进。

我国东北犹如“东方雄鸡”的鸡首，囊括辽、吉、黑三省和内蒙东部地区，地处边陲重地，广袤丰饶，是世界上著名的工业基地、能源基地和商品粮基地，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单元和经济大区。白山黑水，地灵人杰，洋溢着浓郁的东疆特色，充满着绚丽的地方色彩，呈现出多姿的民族风貌和文化交融的学术风采。长白山钟灵毓秀，挺拔秀丽，万古长存，诚为东北象征。《长白丛书》研究系列，植根于关东大地，以面向东北服务桑梓为职志。九十年代，将在一期东北汉文文献整理基础上，聚集同道，横向联合，全面展开东北史地、经济、政治、社会、民族、文化诸方面研究，推出系统的学术成果，贡献于当今东北开发大业。

东北区域研究由来已久。清季咸同以来，俄日频侵，边疆危机，爱国志士群起救亡，“边疆学派”应运而兴。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鸡首”沦丧，东北研究伴同救国大潮勃

然而起，论著迭出。然而由于旧中国学术人自为战，势单力孤，研究成果相形见绌。而俄日列强为侵吞东北，豢养御用文人开展大规模“满蒙”研究，所谓“满蒙学”喧嚣一时，无孔不入。这段屈辱历史是晚清和军阀的罪孽，我们理应吸取历史教训，发愤图强，面向世界，走向未来，在国际学术界为东北学争一席之地，为我国东北争光。

《长白丛书》研究系列将继续弘扬鲜明的地方特色，多彩的民族风格，浓郁的边疆色彩，深远的多源特质，丰厚的交融风貌。丛书拟收入一批资料翔实，立论谨严，富有创见，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科学著作。丛书专著在纵深开掘既往的同时，还将全方位、多角度地面对现实和未来，推出一批富于时代气息的创新之作。

热爱东北，开发东北，建设东北，研究东北，是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东北地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在本领域内奋发有为，无愧于哺育我们的肥田沃土；无愧于火热沸腾的改革时代。

奋斗、进取，待到公元二千年，一批充满时代气息的学术新著陆续面世，我们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告：“东北学”已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了，光荣和未来将永远属于辛勤耕耘的开拓者。

东方雄鸡昂首报晓，呼唤着美好的明天！

李澍田谨序

1990年7月

序 言

鲜卑包括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全面、系统研究鲜卑的专著要算是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此书汲取前人研究的成果，提出鲜卑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不少问题的研究均属卓见，对此后研究鲜卑史的影响甚大，堪称鲜卑史研究的一部开山杰作。

《乌桓与鲜卑》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出版，到现在已三十年有余，这中间对鲜卑的研究已发生很大变化，由文献的研究发展到对鲜卑考古文物的研究，宿白《鲜卑遗迹辑录》，是结合考古资料研究鲜卑的新开创，其影响范围之广超过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一九八〇年，米文平在大兴安岭北段东麓阿里河附近嘎仙洞，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刻石祝文，使对鲜卑史和鲜卑文物的研究哗然，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又推动了对与拓跋鲜卑史源相关问题的研究。先由日人白鸟库吉在《东胡民族考》中推论拓跋鲜卑起源地在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附近；后由马长寿推论在今大兴安岭北段，现在终于发现被史称拓跋鲜卑“祖宗之庙”或“石室”的刻石地点。刻石祝文被发现，对问题的争论似应到此结束。但事实上对问题的争论能不能结束？关键还在于对《魏书·礼志》和《乌洛侯传》的记载是否有绝对无疑的可靠性；北魏刻石祝文的嘎仙洞是否就是“祖宗之庙”、“石室”的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就这个意义说，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是问题新争论的开始。我就是持这样的看法，促使我对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一书又反复阅读和领会，从中发现问题。在将近十年时间内我对鲜卑史研究所能看到的问题，就是本书中所写的。

我认为在对鲜卑的研究中，过去存疑释疑工作很不足，往往是一种说法被提出和肯定后，未曾加以核审就以为是定论，因袭日久，乃至不可纠正。例如谓：“鲜卑郭洛”为“瑞兽”或“神兽”，不符合

古书记载的实际，而是援引后来民族中的语词附会出来的。据汉魏当时人及今考古发现，“鲜卑”，即有鲜卑兽图像的带头（带扣），“郭洛”即大，合称为“鲜卑郭洛带”或“鲜卑大带”。“鲜卑郭洛”是带名，非兽名。鲜卑族属源流，现在的研究认为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为同部、同源、同地，并认为东部鲜卑的鲜卑山与拓跋鲜卑的大鲜卑山同为今之大兴安岭。拓跋部之先人以大鲜卑山为号大鲜卑，地在幽都山之北，北海之南，匈奴、山戎之北，不与中夏相接。北海今贝加尔湖，幽都之山即黑（浴）水所出之山，亦即今黑龙江上游所出的肯特山。山戎、东胡之北部达今黑龙江以南，与大鲜卑山为今大兴安岭北段之说不合。嘎仙洞发现的北魏刻石祝文是真的，但系出自乌洛侯的传闻，以嘎仙洞为“祖宗之庙”、“石室”是不真实的。拓跋部由大鲜卑山南迁只两次：一迁大泽，即第二推演为檀石槐部落联盟之西部大人时的牧地所在，在今蒙古草原西之科布多地；二迁至“匈奴之故地”。宇文部史载出辽东塞外，槐头与莫槐相隔百二十年，谓为一人非是。对鲜卑政权应从当时一体结构的不同层次进行了解，对其政权发展也应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慕容鲜卑与拓跋鲜卑均由氏族制向封建制飞跃，没有经过奴隶制的阶段。对鲜卑研究也要研究作为鲜卑族解体后的鲜卑后裔，元遗山是鲜卑后裔中最杰出人物，在我国文学中是旷世的大文豪，其“中州一体”观是对全国为华夏的理论的提出，是研究中华史发展的重要思想。我基于对以上诸问题的认识，卒成此书，并题书名为《鲜卑新论》。

对民族史的研究，从当前的研究来看，首先要对历史上的“华夏正闰”的传统正统观持批评态度，排除其影响。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至秦统一以后进入统一的多民族的“天下国家一体”的国家，特别是至元统一，又进入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一体”的国家。无论是“天下一体”，还是“中华一体”，都是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结构，由于历史的发展进步，其一体内部的格局是不同的。这样的看法与“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和“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的理论是一致的，能够更深刻地研究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在不同时期的发

展变化。研究民族史,不能只看到中原的民族发展进步,也要看到边境的民族发展进步,对变外为内、变夷从夏要正确地理解。“汉”有两重含义,一指中原王朝,二指汉族。不是汉化就都是汉族化,而更高的层次是华化。在华化中存在多民族、多制,而且华的内容越来越包括各民族及其文化内涵,以丰富“华”。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在封建社会后期为什么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一方面使本族中原化,同作华夏人;另一方面又把本族优良的文化传统融合在统一的“华”中,以及强调发展本族的文化习俗。这是在实现各民族同华中,所采取的多族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政策。统一的多民族是我国历史的实际,但实际不是静止的,不变化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实际的国家政体的内容和结构,有不同的民族思想意识。总的来说是新战胜旧,旧格局要被新格局所代替。鲜卑族在历史的变化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他们的民族共同体虽然以北朝灭亡而解体,但仍然能从族姓中看到鲜卑后裔作为中华中的族姓和个人在历史上继续为中华文明发展作贡献。我们今天的各民族都是从历史发展而来的,都有他们的一部发展进步的历史,成为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不分大小,都应平等的对待,历史上加给他们的或者为取得中原民族和政权的合法地位,也曾自称是先帝先王之后,但实际上他们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源、族源和祖源。汉族在历史上是由多血统而形成的,各民族也不是单一血统的来源,也是由多血统形成的。他们与汉族一样都是我国一体内的民族。是由统一的正统、道统和文脉把各族最后结合为一个中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依存,互相为命,血肉相关,不可分割,合则存,分则亡。《鲜卑新论》所研究的问题,就是想从历史上说明这个道理。

张博泉序于吉林大学三余书屋

1993年3月17日

目 录

“鲜卑”名义研究

- 一、鲜卑与对“鲜卑”一词的应用 (1)
- 二、“鲜卑”的本名与原义 (4)
- 三、“郭洛带”的名与义 (9)
- 四、“鲜卑”与“室韦” (14)

鲜卑族属源流研究

- 一、“本东胡”、“东胡之支”、“别种鲜卑” (20)
- 二、鲜卑属源、族源与祖源 (24)
- 三、两鲜卑的流归 (34)
- 四、对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源流之比较分析 (40)

乌桓山、鲜卑山、大鲜卑山考略

- 一、乌桓的起源地与赤山(乌桓山) (44)
- 二、东部鲜卑的起源地与鲜卑山 (51)
- 三、拓跋鲜卑的起源地与大鲜卑山 (56)

嘎仙洞刻石与对鲜卑历史的研究

- 一、从“祖庙”、“石室”谈起 (61)
- 二、从鲜卑原住地、迁徙看嘎仙洞 (64)
- 三、对拓跋鲜卑文化遗存研究的质疑 (75)

宇文鲜卑的族属源流与演变之轨迹

- 一、宇文称谓与族属源流 (87)
- 二、宇文部的形成与发展轨迹 (91)
- 三、宇文鲜卑的融合与北周 (97)

鲜卑政权与一体结构

- 一、“天下一体”与民族政权 (103)
- 二、鲜卑政权的整体层次与具体层次 (107)
- 三、鲜卑政权的类型与一体结构 (115)

拓跋后裔元遗山的“中州一体”观

- 一、拓跋后裔与元遗山 (126)
- 二、时代与元遗山 (129)
- 三、元遗山的“中州一体”观 (135)
- 四、《中州集》与“中州一体”观 (139)
- 五、从“中州一体”观所得到的启示 (142)

“鲜卑”名义研究

对鲜卑名义的研究,已被多数学者视为已有定论,再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似乎已是多余,实则不然。早在八十年前,学者就提出:“鲜卑”是“祥瑞”的见解。此见解在我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如方壮猷的《鲜卑语言考》、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鲜卑之义为祥瑞,主要是从后来民族的语词中“sai—bi”为“祥瑞”符合出来的。其说自能成理,但结合史书记载的“鲜卑”名义和应用,就会发现问题:鲜卑是其本名,还是“鲜卑郭落”合言为“瑞兽”或“神兽”是其本名?鲜卑为何种兽?“神”、“瑞”是对其兽产生的“神”、“瑞”的观念之称,还是某一兽的固有的名称?“鲜卑郭洛带”的语词结构,以及鲜卑与室韦名称的关系如何?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综合思考之后,才能从“鲜卑郭洛带”词组中了解“鲜卑”一词的地位,以及它的本名称和意义;才能符合当时人对鲜卑一词理解和应用得出完整看法。确切地说,对“鲜卑”名义的诠释,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依据当时人的观念对“鲜卑”一词应用与含义进行综合研究,不是靠在后来民族语言中找一个相符和相似的词来就能解决的。

一、鲜卑与对“鲜卑”一词的应用

史书记载的“鲜卑”及对“鲜卑”一词的应用,是结合我国文献记载的实际研究“鲜卑”名义的重要依据和前提。

“鲜卑”一词,最早见载于《国语·晋语八》。叔向谓赵文子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菹,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现存《国语》有宋代刻印的明道本和公序本两种,《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四部丛刊》影印明代金李翻刻公序本。明道本为“鲜卑”,而公序本则为“鲜牟”。因有两种版本的差

异在理解上便有不同：据明道本者，谓《国语》之“鲜卑”，即指后世的东部鲜卑。马长寿则据公序本认为：“‘鲜卑’当系‘鲜牟’之误”。其理由除公序本为‘鲜牟’外，即根据三国时韦昭注：“鲜卑，东夷国”。因为“《后汉书》、《三国志》都不把鲜卑列入‘东夷’传内，而称之为系出东胡”。因而认为断定此鲜卑为东部鲜卑之祖没有道理^①。其实以这两个理由断是非并不充分，“鲜卑”、“鲜牟”以哪一版本为正，尚无实据，既可说“鲜卑”是“鲜牟”之误，又何不可说“鲜牟”是“鲜卑”之误。东夷与东胡在后入注释中并无严格区分。《逸周书·王会篇》有“屠何”，唐尹知章注《管子》云：“东胡之先”，孔晁则云“不屠何亦东北夷也”。东胡，孔晁云：“东北夷也”。又云：“山戎，亦东北夷”。东夷、东北夷是以地域方位称，在其中有不同的语族。鲜卑、鲜牟不同，是否还有先秦时译音的变化问题？如牟的发声为莫，而莫之发声字亦读为p、b。莫、陌、百、伯、百字互通，那末“鲜牟”的“牟”也可能是卑之同音字的异写，或者是形近而误。这只能是一种思考，也不能卒定。

“鲜卑”一词的应用，从记载看很广，表现在语词领域，民族领域和区域领域三个方面。

“鲜卑”一词的应用，包括以鲜卑名兽、名山、名水、名带，不以“鲜卑”名族，而是以“鲜卑山”名族。把古代图腾崇拜的观念加入鲜卑族名称起因中研究，恐怕距离实际过远。因“鲜卑”的译音用字不同，当然也会出现书写繁简、省略的不同。

（一）以“鲜卑”名兽

从对“鲜卑”一词的研究看，不管是在看法上有多大的分歧，但在一点上已取得一致的看法，即“鲜卑”为被人们视为一种“神”、“瑞”的兽的名称。《书钞》一二九《述异记》：慕容廆十一世祖乾罗，“忽一夕著金银褦铠，乘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鲜卑神之”。《魏书·帝纪·序纪》诘汾南移，“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此“白马”、“似马”的兽当即“鲜卑”，而且“神之”或竟称为“神兽”。

（二）以“鲜卑”名山、名水

以“鲜卑”名山见于记载有“大鲜卑山”和“鲜卑山”^②。以“鲜卑”名水，无明文记载。鲜卑据匈奴故地后，东部鲜卑逐渐联合，在《后汉书·窦宪传》始见“私渠北鞬海”或省称“私渠海”、“北海”。《魏书·乌洛侯传》：“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谓北海也”。于已尼大，在《魏书·高车传》为于已尼水，于已尼陂水。皆指今之贝加尔湖。“于已尼陂”疑是“私渠北鞬”的倒言。“私渠北鞬”旧无解，以音求之，当即“鲜卑”的徐读，而疾读即“鲜卑”。“私渠”或“北海”（白海）当是“私渠北鞬”的省略。“私渠——北鞬”即“鲜——卑”，亦即兹白（驳）。《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海之内，有兽焉，其名曰驳，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北海今贝加尔湖，驳即兹白，其“状如白马”故亦称白马。“私渠北鞬海”之得名盖出自此。史书亦称北海（贝加尔湖）为翰海。翰海为古代北海名。《史记·卫将军骠骑传》：“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姑衍山即今肯特山。乌桓，《新唐书·室韦传》：“乌丸或曰古丸”。桓与丸古今音读“yuan”，如《三国志·魏志·乌丸传》苏仆延，亦称速附丸。衍与延音近，姑衍即古丸、乌丸同音异写。《魏书·乌洛侯传》之完水，即出此山之今克鲁伦河与额尔古纳河。翰之义即白马，《礼·檀弓》：“殷人尚白……戎事乘翰”。注：“翰，白色马也”。“私渠——北鞬海”疑即“鲜卑海”，亦即“兹白海”。

（三）以“鲜卑”名带

作为带名的“鲜卑”，又有师比、私毗、犀比、犀毗、胥比等不同的译音书写。《楚辞·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王逸注：“鲜卑，带头也。言好女之状，腰支细少，颈锐秀长，靖然而特异，若以鲜卑之带而束之也”。

《楚辞·招魂》：“晋制犀比”。《战国策》记载赵武灵王以贝带黄金师比赐给黄绍，当即是此物。依此，“鲜卑之带”就是以黄金把“鲜卑”的图像铸为带头，谓此带为“鲜卑之带”，至于“鲜卑之带”或“鲜卑郭洛带”的构成，以下还要详细分析，此不赘述。

(四)以“鲜卑山”名族

因其族地有鲜卑山，因山而名族这很合乎古代因山、因水名族的实际情况。《魏书·帝纪·序纪》：“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夏，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东部鲜卑是在东胡部落联盟被匈奴击破以后，远窜辽东塞外，保鲜卑山，因以为号。

据此“鲜卑”名称的应用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以鲜卑名兽，名物；二是间接以其山名名族。其应用范围，从民族看，自西北的“义渠兹白”，北方的匈奴、北狄，到东北的东胡。从区域看，从西北，中经北，到东北。而由于胡服骑射对中原的影响，加之中原主动学习，其“鲜卑之带”与胡服一起传入中原。此物还向南影响到楚地区。从战国到三国，“鲜卑郭洛带”是当时人们所习尚之物，因而当时的记载，是研究“鲜卑”以及“鲜卑郭洛带”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它已从鲜卑墓中大量出土，更得到了实物证明。这样就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为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特别是“鲜卑”图像，是今天研究“鲜卑”真实难得的物证。

二、“鲜卑”的本名与原义

对于“鲜卑”名义的研究，在认识上尚有很大的分歧。“鲜卑”为一种兽的名称是公认的，但是鲜卑之本名和原义是什么？“鲜卑”指的是什么兽？有不同看法。下面就分别讲与此有关问题。

(一)对“鲜卑”名义的分析

当前通行看法，“鲜卑”一词的原义是“瑞”，是“神”。马长寿在《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提出的看法是最为完整，他说：“‘鲜卑’之原义似指一种瑞兽或神兽。《史记·匈奴列传》注《索隐》引张宴云：‘鲜卑郭洛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洛为‘kwuk—lak’之音译，其义为兽。‘鲜卑’为‘sai—bi’之音译，其义为瑞，为神。合为之瑞兽和神兽”。并认为《魏书·帝纪·序纪》记载献皇帝南迁时，

有先行引导的“神兽似即‘鲜卑’”^⑤。

此说，所言看起来颇为合理，但据汉魏时记载的“鲜卑”和“鲜卑郭洛带”，又似乎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此说唯一的证据是张宴之说，而张宴之说是释带的，不是释鲜卑。“鲜卑郭洛带，瑞兽名也”，是说“鲜卑郭洛带”的名称，是以一种被视为瑞兽的“鲜卑”而命名的。这种被视为“瑞兽”的兽的本名是鲜卑。而“瑞”、“神”是这种“鲜卑”为东胡人神之才有这个称呼。“瑞”、“神”是人们的观念附加的，不是兽之本名和原义。对此应从广义所指的兽和兽中的某一具体的兽名，以及人们神之而给予的“神”、“瑞”的观念要区别开来。如同今天的大熊猫，而被人们用为“吉祥物”看待，“吉祥”不是它的本名。据载，袞带因有鲜卑的图像，习惯地称其为“鲜卑”，而不必与“郭洛”联在一起方成为兽名。

在对“鲜卑”的研究中也有的对鲜卑作为一种单独的动物名称解释。丁山在《商周资料考证》中谓：“近世学者总说，‘犀比’是鲜卑的对音，我认为鲜卑正是犀比的音转，盖其民族以犀牛为图腾”。按图腾的动物崇拜并以动物名，但氏族，部落不都以动物名，民族以动物的图腾为名，所言欠思考。有的更进而认为“鲜卑”为东胡语“犀”，“郭洛”为东胡语“带”，“鲜卑郭洛带”译成汉语当为“犀带”。东胡人以“犀”为瑞兽，则东胡语犀之“鲜卑”，意译自当为瑞兽名^⑥。这是把“鲜卑”名与兽名统一起来，并把鲜卑的本名和东胡人以瑞、神之兽视之加以区别开认识。

还有一种即把以上两种研究进行综合认识，以求得对“鲜卑”名义的解决。其共同点是认为“鲜卑”为东胡语“瑞”或“神”之义，在这个前提下探求“瑞兽”、“神兽”的本义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兽。有的根据《魏·帝纪·序纪》记载的类马、类牛又非马非牛的动物，即“鲜卑郭落”。并从已出土的鹿纹青铜饰牌认定即是驯鹿。在鲜卑人观念形态中，鹿往往作为祥瑞或神之象征，古代人极易将其崇拜为“瑞兽”或“神兽”，因此“鲜卑郭落”即“瑞兽”^⑦。也有的认为是《逸周书·王会篇》“俞人虽马”的虽马。“虽”是山戎——东胡族系

中流传很广的一种神兽，也可能是一种图腾崇拜。如朝阳袁台子战国墓所出独角马铜牌，独角在额顶，可能即虽马的最初形象。至汉代，东部鲜卑之独角马，独角在吻上，形象有所变化，且愈加完善神奇”^⑥。

从以上对鲜卑一词研究看，当以第二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为当，其一，把“鲜卑”作为一种兽的本名进行考察，“鲜卑”二字就是兽的本名完整概念；其二，把与“鲜卑”兽名无关的另一语词——“郭落”分别视为二词；其三，这样研究问题符合古代把带头的鲜卑兽的图像叫“鲜卑”的原义。只以人们对某兽产生的瑞或神的观念定兽原名，而不考虑到它的本名以及和“鲜卑”一词的关系，在研究问题的方法上是不合适的。至于其兽是犀牛，是驯鹿，还是虽马，应当从已出土的“鲜卑郭落带”的诸部件进行分类的研究，然后再断定有兽的图像的兽和对带命名的关系。

（二）鲜卑当即“兹白”，亦即驳

鲜卑与兹白音酷似，疑即同音异写，“兹白一名驳”，当即“鲜卑一名驳”。犀牛、驯鹿、虽马都不与已发表“鲜卑郭落带”之带头上的兽的图像全类，也不与记载的“神兽”相类，相反的，却与史书记载的兹白（驳）全类。

研究“鲜卑”为何种兽？最根本的要有实物的图像为依据，而从鲜卑墓中出土的所谓“飞马”或“神马”有理由认为即“鲜卑”。一是古书记载的“鲜卑之带”的鲜卑，被称为“私钺头”、“鲜卑金头”、“黄金师比”。它属于带头（即扣）上的图像的鲜卑，而且此出土物正是带头，又是鍍金制成，符合“鲜卑金头”的记载。二是已出土的所谓“飞马”或“神兽”则最有神瑞色彩，当时人们所赋予它的神秘观念的氛围。三是这种“飞马”或“神兽”是与带钩、贝带属同一带之物，可以肯它是“鲜卑郭落带”的带头，而其上的“飞马”图像即是师比或鲜卑。有了这样的凭据，就可以成为研究鲜卑兽的唯一依据。出土牌饰上的“飞马”形状特征是：

1、形状似马；

- 2、吻上一角；
- 3、尾为歧形；
- 4、有蹄有爪；
- 5、有翅能飞；
- 6、头部宽大。

“飞马”的形状特征与史书记载的什么兽更接近些，初步认为是驳。古书关于驳的产地、名称、形状、声态、物象和神异的记载：

《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海内，……有兽焉，其名曰驳，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

《山海经·西山经》“中曲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尔雅》疏引作“身黑二尾”，按应是“身白三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驳，是食虎豹”。

《逸周书·王会篇》：“正北方，义渠兹白，兹白者若白马，锯牙食虎豹”。朱注引《山海经》：“中曲山有兽如马，而身黑(应是白身)三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

《管子·小问篇》：“桓公乘马，虎见之而伏。桓公问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马，虎望见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对曰：‘意者君乘驳马而诤桓，迎日而驰乎？’公曰：‘然’。管仲对曰：‘此驳象也。驳食虎豹，故虎疑焉’”。

《书钞》一二九《述异记》载慕容廆十一世祖乾罗，“乘白马……自天而坠，鲜卑神之”。(亦见《御览》卷三五六、六九一)

根据史书对驳的记载，与出土牌饰上的“飞马”以及《魏书·帝纪·序纪》记载的“神兽”相印证，分类比较于下：

1、驳之产地，在西北义渠戎地区、北海(今贝加尔湖)内，东北的山戎、东胡地。

2、驳之名称，《逸周书》朱注引孔晁“兹白一名驳”。兹白与鲜卑音酷似。

3、驳之形状与出土的带头(扣)的“飞马”形态对比：

(1)“状如白马”，“其状如马”，与《魏书·帝纪·序纪》的“神

兽”如马相符，与牌饰的图像如马亦合，其首宽大，像是河马，乃是“非牛非马”之状。驳马身白，故鲜卑所神之马曰白马。白马当即白驳马。

(2)有一角，与出土牌饰“飞马”吻上有一角相符，驳与朝阳出土的独角马之角在顶上不符。

(3)《尔雅》注引《山海经》驳二尾，《逸周书》注引《山海经》作三尾。郝懿行以为驳有几尾为误，而出土牌饰的兽状图像，其尾作三歧形，可证驳为三歧尾不误。

(4)驳，虎牙爪。据出土牌饰兽状纹观察，非虎爪形，《山海经》、《逸周书》皆记为“锯牙”，而不云虎爪，可能在“爪”字上有脱字。从实物看似有蹄，有爪。

(5)“鲜卑神之”的从天而降的“白马”当是能飞，出土牌饰之“飞马”有翅，亦可相符。

4、驳之声态，“音如鼓”，而《魏书》记载“声类牛”，非其形态类牛盖皆谓其声之大。史书记载的驳之声态，亦可与《魏书》记载的“神兽”相符。

5、驳如马，桓公骑行，虎见之而伏不敢行，此为“驳像”。《魏书》记载献帝邻命诘汾南移，“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而历过“九难八阻”的“神兽”，当即有此驳像的“神兽”。

6、东部鲜卑以“白马”为神，此白马当即“状如白马”的驳，在东胡以其为“神”为“瑞”，所以把驳看是“瑞兽”、“神兽”。

(三)“鲜卑”本义

“鲜卑”本义，就当前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基本有两说，一是以后来民族的语词释“鲜卑”为“瑞”，为“神”；二是以鲜卑即犀比的转音，犀为犀牛，因之认为鲜卑即犀。前者初并不重视鲜卑为何兽而进行研究，后来有人从历史考古遗物中寻求其为何兽，但并不寻求这种兽的本名与“鲜卑”有何关系，仍是以“瑞兽”、“神兽”作为“鲜卑”的本名，也就是说“鲜卑”不是其兽的本名，而是因为“瑞”、“神”而称之为“鲜卑”，是因为在名以外具“瑞”“神”的灵感而

有此名。后一见解的特点是力求探知其兽的本名与“鲜卑”一致，并力求从出土的鲜卑“神兽”在认识上一致，进而认为这种兽因图腾的关系或者是因有“瑞”、“神”的关系而称之为“瑞兽”、“神兽”。后一研究脱出了前一研究约束而进行新探索与尝试。

我很赞成后一研究问题的方法，因为符合“鲜卑”就是带头上的兽，也就是其兽的本名，“郭落”不是“兽”之义，因而在习惯上不能以“瑞”“神”单称那个兽的名，因为“瑞”“神”不是兽所用的专用语。如称某为“神人”，他得是人，而且必须那个人的具体形象和名字，不能说“神”就是那具体人的名的本义，那个人的本名和原义，应当和给予他的“神”的称谓是不同义的。把鲜卑和出土的图像的兽结合研究，我认为更多符合“驳”。“兹白一名驳”，驳白身，“状如白马”，可能当时民族习俗称它为白驳或白马。那么“鲜”之义应是“白”；而“卑”即“驳”之转音，又写作“兹白”，也是“鲜卑”二字的同音异写。鲜卑族人以这种白驳(白马)为神，其族人也喜欢白马，被称为“白骑”，或称其部为“白部”。“鲜卑”其源出自驳的名称“兹白”，这应是它的本名。

三、“郭落带”的名与义

“鲜卑之带”亦称“鲜卑郭洛带”，最早提出的是东汉高诱，继之是三国魏时人张宴。另外也称“黄金饰贝带”、“金刚鲜卑纁带”、“犀比金头带”，又称袞带、大带、郭洛带、贝带、大贝饰带等。鲜卑的名义已如上述，而“郭洛”又不能离开对鲜卑一词的理解。研究“郭洛”的本义应当对“鲜卑郭洛带”有全面的理解，应当从古书记载的实际内容出发，也就是把“鲜卑郭洛带”作为一个整体，从其内容进行多部位的研究，既不能把一物析而为二，也不能把二物合为一，这是研究问题所应具有的最起码的要求和所应遵循的重要条件和前提。